

---

# 马相伯与抗日救亡运动

姜献阁

---

马相伯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杰出的教育家和反帝爱国者。他出生在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之际，去世在 1939 年中日酣战期间，真可谓“生于忧患，死于忧患”。<sup>①</sup>1881 年和 1892 年他两次任中国驻日本使馆参赞及驻神户、长崎领事，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早就有一定认识。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感到：“国难至此，我人出而救济，义不容辞。”他多次讲：“救国本吾人天责，余老矣，然对国民一分子之天责未尝或忘。”<sup>②</sup>当时马虽已年过九十，但爱国精神不让后人。他坚决反对侵略，不辞劳苦，献计献策，奔走呼号，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拟就此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 一 呼吁团结御侮，努力支援抗日军民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马相伯在为日本研究社撰写的启事中即指出：“日本自大陆政策决定，对我积极侵略已为举国一致之主张；自二十一条提出，济南惨案发生，其野心更已露骨表现；今且实行以武力囊括我东北河山矣”，“国家危难至斯，诚达极巅！”“国人曩多忽于知日，故祸变突发，即无所措事”，目前急需“明彼国情，共谋抗御”，“我古民族之新国运实利赖之！”<sup>③</sup>接着他又连续发表

---

① 张若谷：《苦斗了一百年的马相伯先生》，《马相伯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第 233 页。

② 徐景贤编：《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文华美术图书公司 1933 年版，第 12、40 页。

③ 徐景贤编，前揭书，第 168 页。

《为日祸敬告国人书》、《泣告青年书》诸文，还对报刊记者谈话，呼吁救亡。他一方面谴责日本强盗“不仅欲亡我国，实则将灭我种”！把我东北民众“视同草芥，以屠杀为快意，枪射炮轰，不惜随处演出极残酷之惨剧”；另一方面批评国民党当局“对内徒言镇静，高唱不抵抗；对外亦徒乞灵于木偶之国联”，“国家养兵二百余万，年耗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国币”，“然而外侮骤临，即望风远却，崇朝之间，东北半壁山河尽沦敌手”，“最令痛心疾首者，我国今日尚在勇于私斗，而怯于公忿之状态中耳”！他主张团结抗日，大声疾呼：“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今后非国民之公意，对内绝对不许枉费一枪弹；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弹！我国民其猛醒！我国民其亟起！”<sup>①</sup>

马相伯念念不忘收复东北失地，既坚决否认日本卵翼下的伪满洲国，也强烈反对使东北国际化。他在批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时郑重指出：“国人应视东三省一切反对中国之组织，皆叛国之集团，有督促政府明令申讨之必要！且系内政，并非外交，外人无干涉之理由！”他再次呼吁：“全国朝野上下，一心一德，立即团结，以国家土地人民为前提，以全国民众武力为后盾……坚持到底，不还我河山不止！”<sup>②</sup>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马相伯的住所有遭受日军枪炮射击的危险，其家属和身边人员均请他移居租界医院，他却坚持留在原地不动，以表以身殉国之意。当时，《申报》记者来访，谈话中马提到了过去的一件往事：“德皇威廉第二在年青时游历远东到上海黄浦江，不觉说一句触景生情的话：‘这一个国家有四万万人民，八万万只手，一旦起来，谁能抵制他！’”马显得十分激动，对在场的人说：“我希望八万万只手快快举起来，伸到黄海外边去！”<sup>③</sup>稍后，他又为《淞沪御日血战大画史》一书口授序言，热烈赞扬十九路军和

① 徐景贤编，前揭书，第49、6、7、3页。

② 同上书，第46、47页。

③ 马相伯述，凌其翰记：《六十年来之上海》，《申报》1932年4月30日。

上海人民英勇抗战的爱国行动。

同年7月,日军魔爪已伸向热河。马相伯预见到敌人将得寸进尺,侵入关内,于8月间及时地发出了《为抵抗日本第二次进攻华北告国人书》,提醒大家:如果侵略者阴谋得逞,必然复有“千千万万同胞悉成釜中鱼,几上肉,供其宰割,遗憾无穷”!<sup>①</sup>他勉励国难中的军民努力纠正武人富贵自保、文人苟且偷生、国人过于悲观或过于乐观的心理,奋起“作最后之抵抗”,“宁为玉碎,毋为瓦全!”<sup>②</sup>

1932年11月至翌年2月,为唤起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马相伯先后12次对华北同胞广播演说。他苦口婆心,讲得十分沉痛,听者无不受到教育与鼓舞。马在演说中以大量事实论证了“所谓‘国难’一句话说穿,就是四万万人民遭难”!日本强盗“谋我已非一朝一夕”,“先陷我琉球,又割我台湾;先侵占我领海,又进攻我大陆”。侵略者使用“火器毒气,杀人之残,甚于欧洲的大战”!敌人“高唱满蒙是他们的生命线;不知却妨害了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生命线”!他对国民党当局的退让政策表示不满,非常气愤地说:“‘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世上哪有这种道理,拱手让人抢去东三省方面的国家领土呢?九一八事件真可说开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恶例!”他热烈赞扬“义勇东北军,抵抗侵略者,百战不屈,死里求生,是极有意义的”,“义勇军尽忠报国,功绩远超过十九路军淞沪御侮”,“不仅是自救救国,实亦为救世界而战!”并号召每个中国人都以义勇军为榜样,本着“休戚相关,共荣共辱”的精神,都“成为共同的整个组织中的分子”,都“觉得国难是我们心目的共同大事件”<sup>③</sup>,誓死抗战,决不投降!同时他还两次与章太炎联名对外发表宣言,用历史事实证明东三省和热河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给世界人民和正义力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① 徐景贤编,前揭书,第36页。

② 同上书第37页。

③ 徐景贤编,前揭书,第84—85、105、92、83、99、96—97、103、134、133页。

自九一八事变起,马相伯即用鬻书、写“寿”字、写对联义卖,救济流亡者。一二八事变时,他劝亲友成立上海妇女勤俭社,多方支援十九路军作战。1932年11月,他又以人皆有怵惕惻隐之心,发起“不忍人”会。马在谈到此事时说:“现在万人到处掘井,……要陷害我四万万”,“我九三老人敬向可爱的读者诸公,提议组织‘不忍人’会,来救那许多将入井的父老兄弟姑嫂姊妹们。”<sup>①</sup>他委托天津《益世报》社代办,募集钱物,尽力援助东北义勇军和被难同胞。马多次讲:“义勇军,在东北艰苦作战,不是百倍于十九路军么?”他们“大都露宿野外,没有衣服御寒,大家裹些柴草,……没有粮食,只能把草根树皮充饥”。“还有那被兽性的军队残忍虐待下的俘虏,正在饮泪泣血地呼吁老天爷!”“难道他们死光了,我们还能安然无恙么?难道东三省沦亡以后,关内仍旧可以安如泰山么?”<sup>②</sup>他所提倡的中华义勇捐包括国民义务捐和国难特别捐两种。国民义务捐即要求一人一日最低限度捐一铜元,其目的在于:“第一,表现全民合作,与义勇东北军共赴国难的精神;第二,证明我国势不可侮。”换句话说,“这种‘天天不忘救国,人人援助东北’日捐运动的开始,就是我们同胞都有良心有能力,举国各界,一心一德,奋斗图存,为人道主义而自卫”的起点,那么“终有收复东北失地的一天!”<sup>③</sup>国难特别捐分设游艺捐、拒毒捐、奢侈捐、节省捐、烟酒捐、佛事捐、经忏捐、乐善捐等,即补日捐之不足,又有反对奢华,“重道德戒恶习”之意。再者他对“女界赠送寒衣尤表欢迎”!<sup>④</sup>此次活动历时将近三个月,收得捐款洋686元2角3分、棉衣303件。捐献者上有80多岁的老翁,下有十几岁的学生,既有商店货款,也有军队全连捐,成绩斐然。

除救援东北义勇军外,马相伯对熊希龄、朱庆澜等成立平津自

① 徐景贤编,前揭书,第91、92页。

② 徐景贤编,前揭书,第101、111页。

③ 同上书第113—114页。

④ 同上书第108、145页。

卫会,赵登禹、关麟征等将士在长城线上浴血奋战及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均给予大力支持。1933年春,不忍人会安国分会更组织救护队赴前线服务,马不仅热心为救护队同各方联络,还再次发出捐款启事,希望教友和爱国民众进行经济援助。同年4月,应国难救济会之请,《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由其秘书徐景贤编辑出版。马在该书自序中写道:“愿我国民全体认定自助者天助,效法义腊厄尔(即以色列)再造日路撒梭(即耶路撒冷),一手做工,一手拿剑,共赴国难,庶有豸乎!”<sup>①</sup>。1934年,由宋庆龄等出面发起成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马相伯积极响应,并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等文件上签名。

## 二 提出一系列救亡方策,坚持民治救国主张

马相伯不仅重视反侵略的宣传鼓动工作,而且十分注意组织救亡团体,提出各项救亡方策。由他联合唐蔚芝、陈陶遗、沈信卿、穆藕初、黄炎培等发起的江苏省国难救济会,成立于1931年12月,距离九一八事变只有两个多月,是全国最早出现的省级群众抗日救亡组织之一。为了有效的同敌人进行斗争,马还提出了救亡方策,诸如:抵制日货,实行经济绝交,断绝日本的销售市场,使侵略者发生财政困难;以科学发展生产,走富强之路,以利自存;仿古保甲制以兵法部勒子弟,迅速“养成民国的自卫力”<sup>②</sup>;青年学生可利用假期到穷乡僻壤去宣讲暴日侵袭东北实况,唤醒和组织民众;准备防空决死队;“人人投袂而起,以马占山自期”,一旦敌人来犯即随时随地给予迎头痛击<sup>③</sup>等。

马相伯尤热心提倡国货,努力参加1933年国货年活动。他先

---

① 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上智编译馆1947年版,第381页。

② 徐景贤编,前揭书,第5页。

③ 同上书第7页。

后撰写了《国货年献词》、《从立国要义观察国货年的重要》、《国货展览会演说词》等文,宣传使用国货的意义。马是主张抵制仇货的,说这是“弱国反抗强国之最要而且最有效之方策”。但他更重视提倡国货,因为抵货“只是一种消极的方法,是决不能持久的。况且抵制敌国的货品,无形中便是推销另外一国的货品。……我们的金钱照样还是流到外国去,于自身仍然没有丝毫好处”。“我们现在最好的办法,便是用自己的国货来作代替品”。要知道“复兴祖国,正是从提倡国货运动开始呢”!马响亮的喊出了“中国人爱中国,中国人用国货”的口号,尤希望通过国货年“在国人的心里养成对于爱国的观念”,“今后年年,中国同胞,衣食住行,都用国货”,那么“我们对于雪耻御侮工作可算完成一大半了”。<sup>①</sup>

民治救国是马相伯贡献给国人解决国难的根本方法,其核心即“实行民治,重建民国”<sup>②</sup>,以便调动全民的力量,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1932年3月,他在敌机轰炸的恶劣环境下,写给国难会议上海会员的《国难人民自救建议》稿里,旋经修改成《国难刍议》一文。按照马的意见:“在如此生死存亡时局危机中,不用民治,不要人民,实无出路!”<sup>③</sup>“问何谓民治?曰:整个人民,乡邑归乡邑,州郡归州郡,家家户户,自出财力,自出心力,以自治也”,“大抵不外用政事以统一人民利用土地,乡党则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国内交通则愿出于其途,居处则愿藏于其市,水火工虞农牧,又皆能以科学智,而通功易事焉。”<sup>④</sup>考虑到“民治入手,固为救正人心;……然民治实现,必有国家根本大法,以维护全民之天赋人权”<sup>⑤</sup>,他在“刍议”中对制定宪法规定关于人民、政治、土地之基本原则作了说明。他并认为,“改

① 徐景贤编,前揭书第13、53、127、128、59页。

② 方豪编,前揭书,第360页。

③ 徐景贤编,前揭书,第42页。

④ 方豪编,前揭书,第357页。

⑤ 徐景贤编,前揭书,第24页。

造政事，先以局部较易收效”，“必本土之人，管理本土之政事，取给本土之财富，而尽捍卫本土之天责”，故“刍议”中又有实行“地方自治”、“制关税权”与“男女从军”等方案。<sup>①</sup> 该建议实际上是欧美议会政治和中国古代导民政策相结合的产物，目的是：“内则确立自治之政制，外则树立自强之国势”，“并唤醒我旧藩属诸邦之民族自决精神”<sup>②</sup>，以挫败东方日尔曼对中国和世界的挑战。当时李烈钧也提出要“开放政权”，曾访问马相伯，互通声气。与李相比，马更强调“发挥民权，利用土地”及“民治从乡里组织起”<sup>③</sup>，而且范围也不仅限于政权，还包括发展经济、教育、军事训练等内容。不过他的民治论与宣扬信教联系到一起，主张把天条十诫作为救正人心的最好信条，这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关，是可以理解的。

同年4月，国难会议在洛阳举行，马相伯因年老未能前往，特委其秘书徐景贤代表出席会议，发表意见。马对该会抱有一定希望，并递交了《提议实施民治促成宪政以纾国难案》（后附《国难刍议》），请求“政府顺从民意，倡导民治”，“实行宪政，结束训政”<sup>④</sup>，尽快贯彻落实“刍议”中提出的大政方针。这一提案虽然编入议程，合并到政治改革案讨论，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其实国难会议本身也只是咨询机构，会上通过的各件仅属备案存查之类，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尽管如此，他仍不灰心，继续本着“被难者我人民，我不自救，畴克救之？救国之道，……舍政治无他途”<sup>⑤</sup>的宗旨，于7月间发起中国民治促成会，撰有长篇宣言，从哲学、历史、政治、国防等六个方面阐述了实施民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特别强调“欲修明内政，捍御外患，唯有促成民治为我中华唯一救命星，救命圈”。<sup>⑥</sup>

① 徐景贤编，前揭书，第21、22页。

② 同上书，第43、22页。

③ 同上书，第21、88页。

④ 同上书，第25页。

⑤ 方豪编，前揭书，第367页。

⑥ 方豪编，前揭书，第369页。

在此前后,马会见记者、同人交谈或发表文章总不离“民治”二字。

1933年1月和3月,山海关、承德接连沦陷,马相伯再次与章太炎、沈信卿等通电全国,促政府及国人迅速动员起来,“积极恢复失地,根本消灭伪国”。<sup>①</sup>当时各方多主张严惩张学良(原东北边防军长官)、汤玉麟(热河省政府主席),而马却与众不同。他在3月9日关于时局的重要谈话中,虽然也觉得张等必须自赎前愆,“否则难逃天理国法之裁判”,但认为“目前之问题,决非汤张等个人责任问题,实我全民御侮救国问题”。<sup>②</sup>在马相伯看来:造成目前危机四伏者,朝野上下,南北要人皆不能辞其咎;而解决危机的根本办法,则为“唤醒全民之责任心”,使民众“拥护国家,整个御寇”。鉴于“暴寇倾全国之师以犯我,我只以局部抵抗,决不为功”;“国危如斯,将欲对日,政府急需全民之拥护”。所以他坚决要求:“立即召集国民大会,政府与全民统筹国是”,将对日和战,统筹国防、统筹财政等“国是重要问题,付之国民公决”;“出席代表,最好由各县人民自治团体公推之”;“国民大会之决议案,我国民政府必须执行”。<sup>③</sup>召开国民大会是马民治救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1935两年,他继续撰写了《民治私议》、《联邦议》诸文,列举实行民治办法多达十九条。遗憾的是这些得不到响应。

### 三 反对妥协投降,相信抗战最后必胜

在整个抗日救亡运动中,始终存在抗战与妥协投降的斗争,在反对妥协投降方面马相伯也是领先的。由于马年高望重,和许多上层人物关系密切,在宗教界尤有影响,国民党当局有时也想利用他,一般不会把他怎么样,所以他讲话不大顾忌,并且可以发挥别

① 徐景贤编,前揭书,第153页。

② 同上书第67页。

③ 同上书,第67、68页。



人不易起到的作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救亡运动初期，马相伯曾严厉批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马常讲：中国“历朝季世，似有一种公例：对内如虎，对外如鼠，宁送外人，不与家奴”；“这次日人升堂入室，就因一班军人要命，抱不抵抗主义，开门揖盗的缘故”。<sup>①</sup> 每当国家民族利益受到损害，马的心情总是十分烦闷，甚至晚上睡不着觉。1932年5月，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签字，他气得拍桌子大骂：“可恨的日人！”“可恨的政府！”<sup>②</sup> 他反对对日屈辱妥协的态度非常鲜明。

1935年，日本侵略者大搞“华北自治”，妄想使华北成为第二“满洲”；汉奸殷汝耕、武宜亭等粉墨登场，甘愿充当傀儡，打出旗号，宣布“独立”。马相伯为此长叹不已，他对来访的门生说：“中国现在的情形，真是叫人伤心万分！”。“我们中国还远不及一个黑人国的阿比西尼亚。意大利利用五千万的文明人，去打一千万的野蛮人，黑人不屈服，一定要抵抗”，而中国在敌人侵略面前“都会学孔子、孟子的‘不动心’。我们自有办法：（一）投降，（二）送钱，（三）拼杀，不到杀的时候，我们还快快活活的活着。”“我老人已经亲眼看见多次中国的被宰割了，我自己是一个被割存的份子，你们年轻人要小心，不要给人家连生命都割掉了。”<sup>③</sup>

1935年11月，北平各大学教授发表声明，反对破坏国家统一，“要求政府用全国的力量维持国家的领土，及行政完整”。<sup>④</sup> 消息传到上海，马相伯高兴的表示：这是“中国各大学教授所应做的事”，但是“单只靠着一种宣言又济得甚事？宣言之后，必继之以行动”。“因此我希望北平各大学教授（自然也希望全国其他各省各大学教授以至全国的师表）：（一）要对于他们的信仰（即他们所宣言的）生死以之，不要学我们孔夫子的办法‘可以止则止’；……（二）

① 徐景贤编，前揭书，第61、4页。

② 凌其翰：《九三老人马相伯语录》，《申报》1932年5月21日，第14版。

③ 张若谷：《一小时会见马相伯先生》，《大上海》第4期（1935年12月18日出版）。

④ 《申报》1935年11月25日。

要做中国的斐希特(Fichte),不要(做)中国的康德(Kant)”。<sup>①</sup> 这点马自己有所解释,大意是:当1758年东普鲁士被俄军侵占时,康德因为想要补任一个正教授的职位,“不惜卖却他的德意志光荣的学者身份,上书俄女皇摇尾乞怜,……实在是一无足取”。与康德不同,“当法兵攻普鲁士,柏林已经在拿破仑第一的枪尖之下时,斐希特大声疾呼,到处演说,唤醒德国民众反抗外敌的自信力与敌忾,又抛却大学校长的地位到前线去宣讲……。我们的教授们,起码要以斐希特为榜样,中国才有希望”。<sup>②</sup>

当时马相伯还多次同记者谈话,反复阐述有关国家、民族、道德等理论问题,极力鞭策政府和人民共同对敌。他说:国家“是人群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消灭天灾人祸为国家的最大使命之一”。“而人祸之最烈者,莫大于敌国外患。一个国家若果不能合群以抵抗天灾人祸,那已失却国家的资格”。“我们中国的‘国’字,古写本做‘口’”,就是“各各划疆自守的意思,但到后来,国与国间,战争日多,遂发现,保障国家必须一口一戈,即人人皆须执戈以卫国也”。“于是就在‘口’字里头,加上一个‘或’字,意即一人一戈,用现代语言表之,即一人一枪也。必须一人一枪而后国家可保”。说到礼教,马指出:“政府之尽忠,即在保国卫民;人民之尽忠亦即在‘执戈卫国’。不愿执戈卫国的人民皆叛民也;不愿保卫人民的政府,亦叛徒也。‘贼仁贼义’莫过于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或坐视国家民族陷于危亡而竟如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与夫阻挠人民之爱国运动。”他责备统治者把“偌大一个国家弄得七零八落,不可收拾”;更痛恨权奸大憨“甘心拜倒在敌国异族的脚下”,“甚至不惜以同胞的多数生命做孝敬新主人的礼物”<sup>③</sup> 的罪恶勾当。但马对人民则是完全信赖的,用他的话讲就是:中国政治“现在虽然令我们处处抱着悲观,然

① 马相伯口述、王瑞霖笔记:《一日一谈》,上海新城书局1936年版,第158—160页。

② 马相伯口述、王瑞霖笔记,前揭书,第160页。

③ 同上书,第183、187—188、176、91、206、197、198页。

而他的社会深处却燃烧着火山似的烈焰”，最终“要日本军阀政府的命的，……是普遍地深入中国民族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情绪！”<sup>①</sup>

马相伯对一二九运动是热烈欢迎的，运动刚一爆发，他立刻明确表示：“国家存亡兴灭所关，……学生之不能默尔而息，亦不应默尔而息，乃必然之势，亦情理之常。此事（即学生爱国运动）一见之于‘五四’，而民气为之一振，国脉为之一苏；今则此事又将复见，实为兴利除弊当有之现象。”稍后马在回答记者问中讲：“这几年来，时势大坏，国事日非，学生们还是极力遏抑他们满腔热血，闭明塞聪去领受我们许多教育家的‘金科玉律’的教训。你想这些孩子多么可爱！”又说：我们的政府与教育当局“天天教青年们爱国，教他们要‘忠’，要‘勇’，孩子们看见国家到了‘命在旦夕’的时候，出来呼告他们的父母兄弟，诸姑伯姊，赶快起来补救，这不是他们平时能以敬聆师长教训的结果吗？”<sup>②</sup> 记者提出：军政警方对学生的行动为什么竟严加干涉，施以种种压力，甚至予以逮捕呢？对此他没有正面答复，只讲要“敬以质之政府当局”！<sup>③</sup> 不过联系马的一贯立场来分析，很明显他是替学生鸣不平的。

与北平遥相呼应，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也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由马相伯领衔于1935年12月12日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了“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要求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东北伪组织”，“要求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sup>④</sup>等八项主张。接着，上海妇女界、文化界、大学教授、职业界等各救国会相继出现，随着各地救亡运动的展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于翌年6月成立。马积极参加救国工作，先后被推举为上海

① 马相伯口述，王瑞霖笔记，前揭书，第21页。

② 同上书，第191-192、193、194页。

③ 同上书第195页。

④ 《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1935年12月21日出版。

文化界救国会和全教会的执行委员。救国会的许多活动是由他出面或以他的名义进行的,有时救国会领导人会议也在他的寓所开,因为那里比较安全。

国民党当局不顾人民强烈的抗日要求,继续实行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救国会的压迫尤甚。这激起了马相伯的极大义愤,他在1936年夏天的一次谈话中讲:“日本人在天津已经直接压迫人民的爱国运动,我们的政府也继续替日本人帮忙”。按人口,“日本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五倍大的中国,碰到只有自己五分之一的日本的侵略,竟不敢出来抵抗,这叫做‘缩头乌龟’。……人民要出头抵抗,政府还要压迫呢!”“我们中国政府实在是‘帮凶’。”又说:“人民自己决不愿失掉土地,政治更不能丧失掉一寸土地”,“现在中国的国家,却以土事敌,还有比这个再坏的国家么?”“中央就好比会长,终身委员长,就是皇帝,委员长做了这许多年,失地也失得不少了,难道委他的人民不应该有所表示么?”<sup>①</sup>同年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竟通令宣布救国会非法,为“反动”集团,诬蔑该会募捐援绥是敛钱肥己。马与宋庆龄等发表启事,针锋相对的予以反击:“相伯等对于救国阵线,或身居指导,或直接负责,曾否敛钱肥己,想为国人所共谅。十年敛钱肥己者究为何种人,亦难逃国人之耳目。……倘为政府抗敌军队募捐而竟成为反动,则岂非媚敌卖国,乃得称为正动乎?”<sup>②</sup>特别是11月下旬,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七名救国会领袖被捕后,马相伯大义凛然,积极参加营救。他在写给冯玉祥的信里,愿以首领担保七君子无罪,并谓:沈等“血心爱国,人人钦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杀一不义,虽得天下,文武不为”,希望冯格外加以体恤。<sup>③</sup>

1936年12月,马相伯离开上海,应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于斌

① 《马相伯的救国谈话》,《救亡情报》第10期,1936年7月12日印行。

② 《马相伯、宋庆龄等更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侮蔑救国会之通令启事》,《救亡情报》第22期,1936年10月18日印行。

③ 方豪编,前揭书,第404页。

邀请前往襄助教务。在临行的告别宴会上,马曾即席讲话,嘱咐“诸君千万不要忘记抗日救亡是每一个国人的职责”。<sup>①</sup>抵南京后,他仍不断写信勉励上海同人多做救国工作。1937年3月,马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实际是挂名虚衔。迨七七抗战开始,他感到快慰,逾二日作《钢铁政策》广播演说,祝愿“富强中国”,“中国万岁”。<sup>②</sup>1938年春,他在报上发表《停止党争,一致对外》一文,发誓:“甘抛弃一条老命,与广大爱国民众,携手前进,共同抗日救亡,直到胜利。”<sup>③</sup>1939年4月,在马虚龄百岁生日时,全国各大城市为他举行遥祝礼,事后他把所收寿仪送交军事委员会,作救护各战区负伤将士之用,为抗战略尽绵薄。

马相伯晚年由于战争关系不免遭受颠沛之苦,先由南京移居桂林,后又决定迁往昆明,结果在赴昆途中因病滞留越地凉山,医治无效,于同年11月4日客死异域。逝世之前他不只一次对来访者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sup>④</sup>“这次的战争在物质上讲,我们决敌不过日本,幸赖我们有正义公理,才成为大义敌不义,有理敌无理”,“日本不知克己便是失败,最后胜利,你们是一定看得见的”。<sup>⑤</sup>马在病中仍注意新闻时事,甚至弥留之际还连呼消息、消息,……足证他是一直关心国家命运,相信抗战必胜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① 见韩希愈《反帝爱国百老人马相伯》,《人物》1983年第2期,第121页。

② 《马相伯播讲钢铁政策是富强的捷径》,《中央日报》1937年7月10日,第3版。

③ 见韩希愈著,前引刊,第120页。

④ 张若谷:《苦斗了一百年的马相伯先生》,《马相伯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12月版,第334页。

⑤ 方豪:《谒九九老人》,《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湾燕京印书馆1969年印刷,第2565、2564页。